
天台山和合文化论纲^{*1}

何善蒙

【内容提要】: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而天台山和合文化,则是基于天台山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的一种和合文化的表现形式。学界关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讨论已经很多,但是,对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以及它和中华和合文化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等这些基础性问题,长期以来缺乏梳理。本文从天台山文化特质出发,从文化地理、历史演进和思想脉络角度的考察出发,认为天台山和合文化是台州地域内因“和合”思想而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是以儒、释、道三教圆融为核心,以寒山、拾得“和合二圣”为突出代表,是天台山文化的精髓与本质特征,与台州民间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形态和活的样本。

【关键词】:天台山和合文化;基本内涵;本质特征;中华和合文化

和合作为一种理念,是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本质的特征,体现了中国古人在解决自我存在、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等层面所具有的圆融通达的智慧。由此,中华文明在豁达开放、兼容并蓄的胸襟之下,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和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被广泛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和合文化。而天台山因为有“和合二圣”的存在,使得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中华和合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意义。天台山和合文化,是台州地域内因“和合”思想而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是以儒、释、道三教圆融为核心,以寒山、拾得“和合二圣”为突出代表,是天台山文化的精髓与本质特征,与台州民间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形态和活的样本。和合文化是天台山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活的灵魂,这是在天台山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与天台山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时候,就必须回到天台山和天台山文化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形象中去,才能够获得关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最为直接的理解,并且由此确立天台山和合文化在整个中华和合文化传统中的独特内涵、意义和价值所在。

一、天台山的文化意义和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确立

天台山文化,虽然有广义、中义和狭义的区别^①,但是,不管是取何种意义来讨论天台山文化,我们所指的都是围绕天台山展开的,只不过是范围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台山就已经超越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山脉的概念,而是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文化意义。事实上这一点在传统的理解中,也是非常清楚的,比如当年“山中宰相”陶弘景在《真诰》中就说,“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转引自徐灵府《天台山记》),这样的对于天台的命名方式,很明显,就不是在一种客观描述外在自然形势的意义上来讨论了,而是赋予了天台山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天台民间所谓的“九龙造天台”的传说,则更是直接地将一种神秘的文化意义赋予了天台山。

所以,当我们在谈及天台山的时候,我们更多指向的是天台山的文化意义,或者说,作为文化内涵的天台山。那么,天台山的文化意义应当如何去理解?在我看来,作为文化意义的天台山,至少是表达了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或者说三个重要的维度:山水神秀、浙东的区域特征以及南北交融。山水神秀,是从天台山的自然特征来说,此种地理特征决定了隐逸文化和宗教文化在天台山文化传统中的根本性影响;浙东的区域特征,是从浙江文化区块的版图上来说,天台山是属于浙东,具有着浙

¹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2017年浙江省文化工程二期“天台山和合文化研究”项目的支持。

作者:何善蒙,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州学院和合文化研究院院长。(杭州3110028)

东文化的基本特征；南北交融，主要是从天台山文化形成的意义上来说， 主要是因为汉晋以来衣冠南渡，北方士族的南移，带来了南北交融从而确立天台山文化的内在特点。

山水神秀，这是大自然给予天台山的恩赐，而天台山作为一种文化形象出现在文人的视野中，大概首先也是因为它的山水神秀的特征， 比如对于后来天台山形象在文人世界中有极大影响的《游天台山赋》， 即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给予了天台山以极高的褒扬，“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然图象之兴，岂虚也哉！ 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 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 余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俛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缨络， 永托兹岭， 不任吟想之至， 聊奋藻以散怀。”（孙绰《游天台山赋·序》）章安令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对于天台山在文化意义上影响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那个时候开始，天台山的山水神秀就逐渐成为了文人雅士所向往的地方， 而至唐诗之路的出现， 则把这样的一种文化风格彰显无疑。当然，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除了对于山水神秀的描写之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孙绰很自然地将这种山水神秀和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所谓“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的说法，就是从这个角度表达出了山水神秀背后所承载的宗教文化意义。从此后天台山文化的发展来说，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视天台山为圣地，佛宗道源的地位，由此而确立。因此，在历史上，天台山就是宗教文化的圣地，是隐逸的理想之所，宗教文化和隐逸文化的结合， 就构成了天台山文化意义最为深刻的内涵。

天台山地处浙东， 具有非常明显的浙东文化的特征。两浙的区分，始于唐代，自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析江南东道为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浙东、浙西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行政概念和文化概念，在浙江境内民间流传的所谓“上八府，下三府”，就是对这种区划的反映，而台州就是处于“上八府”之中^②。浙东、浙西虽然都是在浙江境内，然而，两者的差别却也是非常清楚的，“浙西多水，除了于潜、昌化这一边，都是一苇可航。浙东呢，除了绍兴市水乡，温州、宁波言海滨，其他各县，都是山岭重叠。严州、台州、处州各府更是崇山峻岭，仿佛太行王屋的山区。”^③因此，两浙的文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嘉靖《浙江通志》），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桀骜，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所以，坚韧、豪迈、敦朴成为浙东文化的基本品性，所谓“台州式的硬气”，大体也是源于此种文化地理。天台山处浙东，“山有八重， 四面如一” 的这种生存事实， 也使得天台山的文化具有了山的坚毅和包容的品性，而这也构成了天台山文化的内在特点。

天台山文化意义的呈现，和西晋末年以来“衣冠南渡”的事实密切相联。就整个浙江区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来说， 永嘉之乱所带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会稽一带，因为北方士族的南迁，成为了当时文化的中心，所谓“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南北学风的差异，以及南北学的融合，都是在这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此一时期，对于天台山文化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谢灵运的“伐木开径”对于天台山文化的向外推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后，顾欢隐居天台山，开馆授徒，受业者常近百人，而其所撰《夷夏论》则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天台山文化的典型代表——佛教天台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智者大师在融合南北不同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最终创立佛教天台宗， 这就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如果我们回到南北朝的具体氛围之中来考察的话，所谓的南北学风，除了佛教的南北风格不同之外，还有北方重经学、南方重玄学的区别，关于这一点，事实上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形成，在《世说新语》中就有非常著名的讨论，“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第二十五》）。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南北差异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南北学风，指的就是南北的两种不同学术风格，诸如前引褚季野、孙安国、支道林所言。狭义的南北学风，可以指佛教的南北不同风格，禅观和义理的差异。而智者大师对于南北学术传统的融合，不仅是佛教的南北不同特点的融合，实际上也是对南北不同学术风格的融合。从这个意义来说，天台山文化的融合的特征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在融合的意义之上，才有天台山文化的产生^④。

由此，从自然特征、文化地理以及文化交融的事实来看，作为文化意义的天台山实际上从其开始，就是同和合的特点相结合在一起的，天台山文化意义的确立，就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确立。

二、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一体两翼三个层面

以往对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理解，大体上是沿袭张立文先生在《和合学概论》中所提出来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天人和合、社会和合、身心和合三个层面来讨论天台山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和合特质。当然，从学理上来说，这样的讨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是可以把天台山文化中所包含的和合之理呈现出来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方式，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体现出天台山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如果我们说和合文化是天台山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活的灵魂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和合文化应该是一个具有内在整体性的形态，而不仅仅是说它讨论的问题是符合和合学的基本设定。

由此，我尝试提出“一体两翼三个层面”的说法，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所谓一体，就是以宗教文化为体，这是天台山文化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智者大师所开创的佛教天台宗，道教的天台仙派、道教龙门派南宗等等，都是天台山在宗教文化上的典型代表，也是天台山文化的重要支柱。所谓佛宗道源的提法，事实上很清楚地显示出天台山文化的独特性意义。因此，天台山和合文化，实际上是基于宗教文化的和合。

而两翼，则是在天台山宗教文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两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分别是济公活佛与和合二圣。毫无疑问，这两者都是在天台山极为丰富的宗教文化氛围中产生出来的，但是两者有着内涵上的差别。济公活佛的形象，立足点是在宗教文化，是站在宗教的角度来沟通世俗生活。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方式，必然是要和具体的信仰者的生活相联系才能够发挥其作为信仰的作用，而济公活佛的信仰，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佛教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切实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中，宗教精神可以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因此，济公的形象当中表达出来的是，宗教的和合精神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而和合二圣的形象则不同，作为天台山和合文化最为典型的符号，和合二圣的出现，意味着天台山作为和合圣地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说济公是从宗教的意义表达来沟通世俗生活的话，和合二圣则更多是从世俗生活来体现宗教精神，其立足点在于世俗生活本身，而并非是宗教精神。从和合二圣的产生以及广泛流行来说，体现的都是民间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这种期待表达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寄托，这也就是和合二圣之作为宗教形象的意义。所以，这两翼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前者体现的是从宗教精神到世俗生活的落实，后者则反映的是世俗生活对于宗教精神的依赖，由此，宗教文化的根本地位在天台山和合文化中得到了强化。

三个层面，是指天台山和合文化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宗教哲学、宗教生活以及世俗生活。如果说宗教文化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根本，那么这样的宗教文化必然从宗教哲学理论的建构，经由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实践，然后落实并影响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这样就非常圆融地达到了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和合，从而成为一个有机的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整体。

在宗教哲学的层面，这毫无疑问是天台山和合文化至为精致的表达，这从天台宗和道教南宗的宗教哲学中，可以得到非常直接的说明。智者大师的天台宗哲学，在《法华经》“会三归一”的智慧启迪之下，以“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一念三千”、“性具实相”、“性具善恶”等基本哲学命题，实现了对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各种异说的融合和超越，其哲学思辨能力可以说完全超越了此前中国古代的所有哲学家（包括出世的和世俗的），“智者大师真了不起，在谈心性的智慧方面，在融会消化佛教的方面，其学思的地位真是上上的高才大智。他的《摩诃止观》真是皇矣大哉的警策伟构。西方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古的奥古斯丁、圣多玛，与近世的康德、黑格尔之流，在其学术传统中，都未必能有他这样的地位与造诣”^①，“在佛教史的长河中，如果认为释迦是首先提出佛教根本原理的圣人，那么就可以说，天台（智者）是把这种佛法的根本原理形成一种哲学体系、理论体系的哲人。我认为佛法作为一种理论，在天台（智者）的身上已达到顶峰。”^②宋代金丹派南宗之祖张伯端，其所著《悟真篇》，在会通三教、道禅融全的基础上，开创了道教发展史上重要的金丹派南宗传法体系，即所谓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陈楠，陈楠传白玉蟾的内丹传授体系，即道教南宗。在《悟真篇》中，张伯端立足于“天人同构”的哲学基础，所谓“大丹妙用法乾坤”，即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每个个体的人都可以通过修炼自身的阴阳，交媾坎离，返根复命，达到与大道的相通。而人修道就是修性与命，命是道之载体，性是道之体现；道教修行

的最终目标是证得无上至真妙觉之道。近人丁福保在《道藏精华录百种》中，称《悟真篇》为“辞旨畅达，义理渊深，乃修丹之金科，为养生之玉律”。从智者大师的天台宗哲学，到张伯端的道教南宗内丹学，虽然两者在义理层次上是有差异的，但是，作为一种以和合为基础的宗教哲学的表达，两者在各自的传统中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也为天台山和合文化确立了最为坚实的宗教哲学基础。

宗教哲学和一般的哲学形式的最大差异在于，宗教哲学是和宗教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宗教形式，它必然要求在学理的基础上表达出宗教的行为方式，亦即必须落在宗教生活层面。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在这个意义上，都有着非常清晰的宗教生活层面的反映。在天台宗方面，基于智者大师在宗教哲学角度的设定，天台宗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修持方式，强调止观双修，定慧并重，在天台宗，这两者就像鸟的双翼、车的双轮，想要到达目的地，必须两者兼备，缺一不可。止观双修对于天台宗人的最为根本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天台宗才有“教观总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才表达出最为圆融的一种形态，从而能够兼融诸宗。而道教南宗在修持方式上，同样极具兼容并蓄的特点，张伯端强调不离世俗、禅道兼修，这样一种极具包容的气势，使得道教南宗的内丹理论不仅义理精深，而且修持切实，特别是其“形神合一，性命双修”的具体丹法实践，对于内丹学理论在宋明之际的发展，有着根本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如此，张伯端所著《悟真篇》在丹道史上获得了与“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并列的地位，“是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的修持方式来说，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特征，儒释道三教的价值不仅在它们的宗教哲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安顿，而且在具体的宗教实践、宗教生活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达，由此，当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在以天台为基础展开的时候，这样的宗教义理和宗教行为方式，自然会影响到世俗社会，从而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形成一种和合的宗教（文化）氛围，这是天台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地理特征。

由此，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最后一个层面的表达就是世俗生活中和合价值的实现。天台山浓郁的宗教文化传统必然会影响到老百姓的世俗生活，宗教氛围的浓郁，使得民风醇厚、虔诚，民间信仰的形式也极其丰富，天台山和合的宗教精神，通过民间信仰的形式具体化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这种基于宗教哲学高度的和合精神，成为一种非常直观的、普遍的日常生活形式。此外，按照中国的社会的基本事实，儒学一直是社会生活的主导价值，这一点在天台山也是如此。当然，天台山的儒学因为和强大的佛教、道教的影响相互结合，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形态，以宗族文化为基础的准宗教形式。这种儒学的形态，首先强调的是宗族的立场、传递的是伦理的价值，由此，对于价值立场的坚守成为了天台山儒学的一种质性立场，典型的代表是方孝孺、齐周华；而同时，因为三教共存的事实以及天台山宗教文化浓郁的氛围，使得天台山的儒学也更多地表达出圆融的特征，这一点在目前所能追溯到的天台山最早个人讲学传统开启者顾欢那里就非常清楚地表达出儒道融通的特点，而后来北宋天台县令郑至道“四民皆本”的理念，都是和合理念的直接表达。当然，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展到宋明以后，那么，天台山儒学所表达出来的三教融合的特征，则是更加鲜明。

从宗教哲学出发，经由宗教生活（宗教实践），并因此落实到世俗生活，从而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的展开系统，天台山和合文化由此具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脉络。在这个系统中，宗教哲学（宗教精神）是最为根基的，而宗教生活则是宗教精神的直接表达，世俗生活则是宗教精神的现实引导结果，由此既构成了一个理论上的完整表达，又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活的和合文化的价值。因此，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和合文化（一种有信仰的文化），它是以宗教哲学的高度和圆融通达的灵活度来构成对于人的生活的引导，从而产生它所具有的持续有效的影响力。

三、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本质特征：三教和合为基础的社会和谐

依前所论，当我们从“一体两翼三个层面”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把握到天台山文化的特点。当然，这样的解释框架也并不妨碍我们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理论内涵，因为作为一种有信仰的和合文化，它自然是要解决这些层面的问题。而对于宗教文化维度的强调，则是基于天台山文化的特质而来的。

宗教文化基础的提出，以及有信仰的和合文化的确认，都是基于把天台山和合文化作为一个活的整体来看待的要求。从而，我们可以在梳理天台山和合文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更加准确的把握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本质特征。我认为，天台山和合文化就是以三教和合为基础的社会和谐。这样的定位，无论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探析的角度，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的。

首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天台山文化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三教和合。与我们一般意义上讨论宗教文化的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天台山的宗教文化氛围与其他地方有着明显的差别。可以说，在中国诸多的名山之中，或是以佛教著称的（比如普陀山），或是以道教著称的（比如龙虎山），很少像天台山这样属于三教并存、融通发展的。天台山的山水神秀，汉晋、南朝，天台山三教就先后开始兴起。及隋唐以后，三教迅速发展，尤其释道达到最盛时期，天台山境内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兴建，而儒家的书院也是迅速发展。三教共同发展，并且和合无碍，这是天台山最为突出的特点。比如在现今作为天台山标志的赤城山，这里既是天台宗五祖灌顶、九祖湛然讲经说法之地，又是道教高道葛洪、魏夫人（魏华存）修炼的第六洞天玉京洞之所在，当然，也还是儒师学子的教读之处，相传济公活佛在出家之前就是在这里接受的儒家启蒙教育。为什么天台山儒释道三者可以和合共处、融通发展？我想这应当和天台山的特点有着直接关联的。天台山的山水神秀，无论对于佛教和道教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圣地。在天台的佛教传统中，对于智者大师选择天台山有诸多的解释、传说，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强化出天台山与佛教之间的因缘，而智者塔院（真觉寺）山门外照墙上写的“即是灵山”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天台山与佛教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对于道教来说，天台山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修仙之所，是洞天福地所在。因此，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在其修炼地的选择上，天台山都是非常重要的选项。这主要是因为天台山的特点，合乎宗教修持的需求，因此，自汉晋以来，高僧大德于天台山静修的，接踵而来。作为一座宗教名山，天台山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理特征符合了宗教修行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各种神秘传说的加入，使得它的宗教维度更加鲜明。佛道共处天台山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若要获得自身修行的最大效果，相互融通也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因此，这种宗教融合氛围的形成，是和天然的地理条件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关联。而儒家则作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准宗教形态，也是这个小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不可或缺的，由此，在地理上形成的三教和谐共生，在学理上则促成了三教的各自特色理论形态的形成^⑦。

其次，天台山的这种融合的宗教文化，其最终的指向是社会生活。宗教理论，按照一般的方式，是以出世的形态为主导，其价值指向应该更多的是超越层面的。而天台山的宗教文化，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社会生活的指向。智者大师开启的天台宗，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基础，强调真俗不二，这事实上是很好地处理了真谛（空）和俗谛（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是在真谛的基础上确立了俗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世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在智者大师“一念无名法性心”的说法中，可以得到最为直观的表达。智者的天台宗，当然是以佛教义理为基础的，但是，佛教的义理和世俗之间的和合，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智者大师在佛教义理系统之中，对于世俗生活种种价值的确认，为佛教中国化的实现，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种种的世俗方便法门，并不违背佛教义理，这样的和合，合乎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特征和生活事实，使得中国佛教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天台山的道教，也是在融通世俗的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理论系统。从司马承祯的“神仙即人”的说法，就很清楚表达出道教与社会生活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张伯端的南宗道法中得到更为直接的表达。张伯端强调对于世俗道德价值的遵从，修道不离世俗，反对在形式上的出家离俗、归隐山林。这样的形式，也是很直观呈现出来对于世俗生活的重视。因此，我们说天台山的宗教文化，最终指向是社会生活，应当是成立的，尤其是当我们从和合的意义上考察的时候，因为和合的最终实现，并非只是局限在宗教境界之中，而是在宗教的生活和世俗的生活之间达到了圆融无碍的状态，由此，在社会的层面展现出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形式。

最后，和合二圣形象的确定，更加强化了天台山宗教文化的社会生活维度。以寒山、拾得为代表的和合二圣，毫无疑问，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和合二圣的意义上，天台山之作为和合圣地的理据是不言自明的。而和合二圣的产生，如前所言，事实上就是世俗生活对于和合理念的表达^⑧。所以，如果我们考察和合二圣的形成以及作用的话，事实上，社会生活是最为基本的原因。出于社会生活和谐的需要，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和合二圣的形象。而和合二圣形象确立之后，它所作用的最为重要的范围，也是民间社会生活的层面，在社会生活的和谐引导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我们要讨论天台山和合文化对于社会的意义，那么，以和合二圣为代表的和合理念，就直接表达了民众对于和合美满的社会生活

的渴望。而民间各种和合二圣形象的广泛的使用，都表达出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代表的民众素朴的生活理想。

因此，我们认为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三教和合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宗教的和合是整个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根基，建立在三教互通、互融基础上的天台山宗教文化，其最终的价值指向是在于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和谐。而正是在引导、规范现实生活的意义上，天台山宗教文化有了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力。

四、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鲜活样本

建立在宗教文化基础上的天台山和合文化，构成了天台山文化的活的灵魂和本质特征，这样一种和合文化以对社会生活的引导和规范作为根本的旨趣，最终呈现出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和谐价值。而正是在沟通神圣的宗教义理和鲜活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天台山和合文化具有了其特殊的价值。我们通常说，和合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那么，天台山和合文化与中华和合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需要最后在学理上予以确认的。

首先，应该可以确认的是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和合文化是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上来说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和合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意蕴。在习近平同志的《江新语·文化育和谐》中，也非常清楚地认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基于此。”这样对于和合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定位，应该说是非常之准确的。当然，如果我们要清晰地把握和合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就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具体脉络中去考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十分丰富，历史形态复杂，我想如果从最为基础的事实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三教并存作为基础的，儒释道三教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儒释道三教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是中华文化在历史脉络中的具体展开，由此呈现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如此，如何有效地解决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和谐发展，就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和合性的具体表达。换言之，中华和合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在解决三教并存共生的问题中呈现出来的。从前文的分析来说，天台山和合文化恰恰是在具体的三教互融的事实上展现出来的，所以，天台山和合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主要议题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天台山和合文化正是以融通三教义理为基础，形成了以宗教生活为依托，以引导世俗社会生活为归依的基本形态，而这样的形态，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处理三教关系的意义上获得共生发展，提供了天台山的具体解决方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台山和合文化，对于中华和合文化来说，是一种典型代表。

其次，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鲜活样本。中华和合文化是从历史的脉络中逐渐形成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而被确认出来的，对于当下来说，这样的和合文化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现实的意义，对于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而天台山和合文化，因为它的最终价值是落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上，由此具有了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活是一个随着时代改变而不断丰富的事实，这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说，都是可以获得应对和引导的方式。所以，对于天台山文化来说，和合文化作为本质特征和活的灵魂，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台山和合文化正是在应对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由此形成了天台山和合文化所具有的以宗教文化为基础的形态。从事实的意义上来说，天台山和合文化也正在现代的社会转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台州市“山海水城，和合圣地，制造之都”的城市定位，以及天台山和合小镇的倡导，实际上也是希望天台山和合文化在规范和引导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正是历史上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活力所在。如果说，在历史上天台山和合文化因为是一种有信仰的文化，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那么，就今天而言，我们可以在天台山和合文化的传统基础上，转换成为有精神基础的社会生活，使得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今天依旧很好地起到引导社会生活的意义。天台山和合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日并持续发挥作用，其内在的生命力机制，是值得重视和关注的。天台山和合文化，作为中华和合文化的鲜活样本，应当在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换方面，做出更多尝试的努力，使

得和合的精神为当下的社会生活注入新的动力。

因此，典型代表是就历史的层面确立出来的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地位，而鲜活样板事实上就是赋予天台山和合文化以更多未来发展的责任。

注释：

①天台山三层含义的说法，可以参考周琦先生的说法。周琦先生认为，天台山有广中狭三义。广义天台山是指天台山脉，包括支脉四明山，入海余脉舟山群岛。中义天台山是指台州，台州因天台山而得名，故唐代起，台州士人即以天台名州，成为郡望。狭义天台山是指天台县内诸山之总称。具体论述可以参考周琦《天台山文化的五个“同”》，《台州晚报》2016年5月21日人文版的相关论述。

②自唐代开始，浙江东道领新安江以南、福建道以北的原江南东道地，包括今天的浙江省除浙北之外的所有地方，即睦、越、衢、婺、台、明、处、温八州，而这个范围，后来基本没有太大改变，比如清乾隆年间的《浙江通志》称“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就是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大体上，浙西属于吴地，浙东属于越地。

③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④移民对于天台山文化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据1988年统计，民国前（不含民国）入迁的尚存127姓、252种。其中入迁时间可以确定的有219种：东晋1种，隋代2种，唐代15种，北宋38种，南宋58种，元代25种，明代56种，清代21种，以两宋和明代最多。入迁的氏族，往往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族文化。移民大体是从北方迁入的，具有北方的文化性格，而由此使得天台山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南北融合的特点。这一点从智者大师那里就可以得到非常直接的表达，而智者大师之后，天台山文化的这一特性因移民的不断迁入而强化。

⑤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⑥池田大作：《我的天台观》。

⑦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天台山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三教和合共生的基本事实。由此，我们也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诸如刘阮遇仙（最早见于干宝的《搜神记》）这样的美妙传说会发生在天台山，因为从这种地理的自然特征中，就包含了和合的基本氛围。

⑧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以万回作为和合神，还是以和合二圣作为和合神，事实上都是民众生活的现实需求的反映，体现的是民众对于和合生活的追求。而最终以和合二圣作为和合神，则是因为在二圣的意义上，更能彰显和合的意义。这种彰显，不仅是因为合二为一的意蕴，更重要的是，和合二圣的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由此可以树立一种有宗教信仰基础的社会和合生活。